

心路留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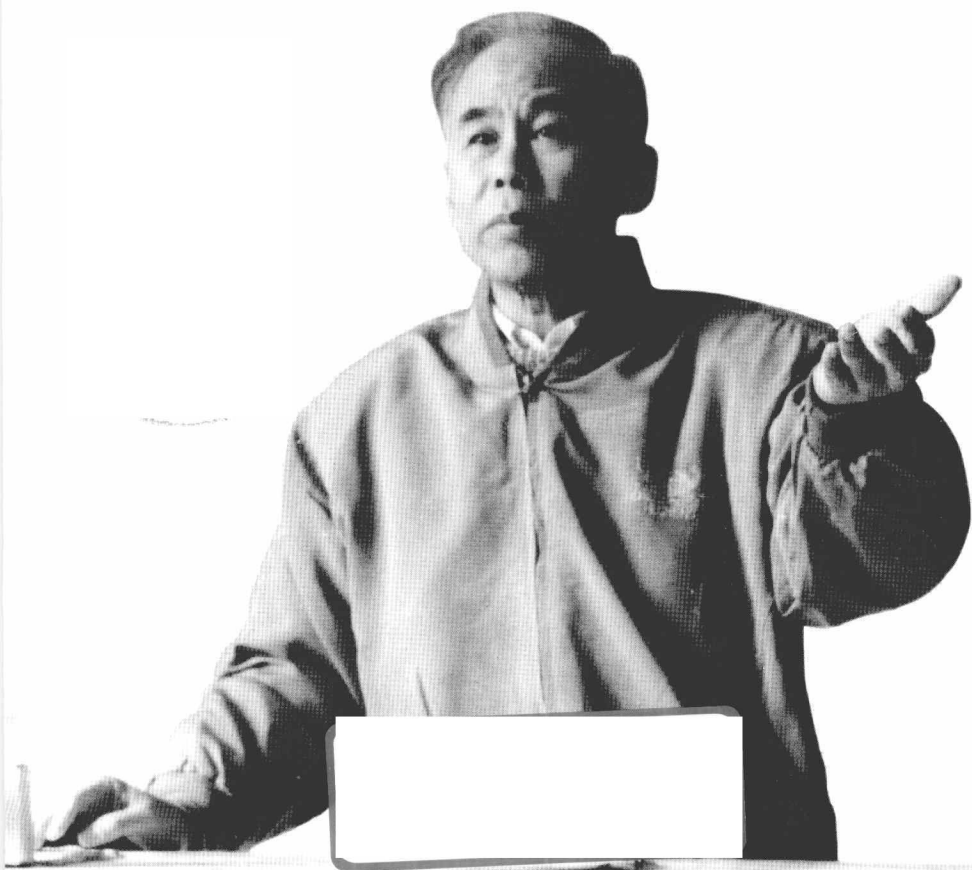
—— 郭启宗自选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心路留痕

—— 郭启宗自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路留痕/郭启宗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0

ISBN 7-5059-4409-6

I.心… II.郭…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5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779 号

书 名	心路留痕
作 者	郭启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01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409-6/I·4136
定 价	35.00 元

郭启宗自述(代序)

接到通俗文艺研究会拟出版会员《风采录》的通知,突然有点小小的冲动,想把自己40多年来的写作情况、文学艺术活动情况,勾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来。

—

和文学有缘,也许真和一种神秘的预示有关。

我周岁时,按当地的惯例,面前摆着十二种物品任你挑选——据说那将预示着你一生的职业和前途命运——我一下子扑上去并紧紧抓住的是书;我二周岁时,在路上拾到半截铅笔,兴奋得胀红着脸跌跌撞撞跑回家,把它郑重地交给母亲。

直到我成年之后,母亲还常常念叨着我幼时的这两件事。

也许,这成为一种动力,成为我奋发读书,追求着自己的梦、自己的幻想的一种动力,也成为我父母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支持我读书的一种动力。

由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虽因经济困难而两度辍学,但仍努力上进,也渐渐显露出一些个人的特点来:我朗诵,我演讲,我表演,我写文章,在班里,在校里都有点小名气。尽管开头是那样地机械、呆板,比如演讲吧,连开头讲那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时,头该如何摆动,眼睛该如何环视,双手该如何向前伸出,一招一式都按老师教的办,但在解放前配合各种运动搞街头宣传时,当秧歌队、腰鼓队热闹开场,把听众吸引、聚拢过来之后,十三、四岁的我便能从容地站到高高的椅子上,按事先准备好背熟了的稿子,把“解放军解放厦门”啦,“志愿军到朝鲜抗美援朝,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三反五反,打倒奸商”啦等等,激昂慷慨地说一通,引来阵阵掌声;又比如写文章吧,开头也是那样地机械、呆板,小本子上常摘一些优美的词句,无非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春光明媚,阳光灿烂”之类的,在写作文时尽量点缀其中,但到高中时,我的作文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被老师贴在教室前的黑板旁供大家参考,被老师在课堂上朗读要大家学习了。

不过,我的理科成绩却显然逊色,高二上那学期还补考了代数。

最近,和一位高中时的老同学见面畅谈,谈出一些有点出乎我意外的趣事

来。这是一位当年学习成绩十分优秀的同学,理科尤为突出,但临毕业的体检却得出他不适于报考理科许多专业的结论,老师动员他改报文科,他忍痛割爱同意了,但突然的急转弯,该怎么办?老师对他说:“你改文科,注意跟着郭启宗,他看什么书,你跟着他,他怎样复习,你跟着他,准行!”40多年后提起此事,我既有点乐,也有点疑惑,他看我不很相信,笑着补了一句:“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连你上厕所我都跟着呀!”说罢,我们都前俯后仰,哈哈大笑!

朝气蓬勃的年龄,又生活在朝气蓬勃的年代,当时我的头脑单纯得很:既然兴趣文科,报什么专业没多考虑,首选中文、新闻!

开始准备应考,便想到一定要写一篇漂亮的作文。当时的作文题目,大都与国家大事有关,那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各地纷纷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我所在的漳州市(现芗城区)工商业改造搞得风风火火,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大会开得隆重热烈,我认定作文题肯定与此有关,并认真打好腹稿。刚进考场,一看作文题是“生活在幸福的时代”,一愣:怎么会是……?可立马回过神来:进入社会主义,不正是幸福的时代吗?妙极了!于是奋笔疾书,先把庆祝大会的盛况、群众敲锣打鼓、欢欣鼓舞的场面描绘一番,接着笔锋一转来了个倒叙,写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提前实现,联系自己家庭过去的苦,今天的甜,……一切真如泉涌一般,答完题,踌躇满志地迈出考场。

不久,接到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不久,扛着行李跨进厦门大学校门,又不久,在一次班会前,一个个头不高,结实,显然比我年龄大些的人大大咧咧地叫道:“哪个叫郭启宗?”我怯怯地应道:“我是。”并向他走近两步,他把我上下扫了一眼说:“你是我们班第一名!”哇!全班110人,我第一名!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此后为这真高兴了好几天,心里也暗暗得意:能得此高分,大概和那篇作文有些关系吧。

过些日子,同学之间相互熟悉了,我发现,解放后的这第一次大招生,真是人才济济。我们班从年龄看,最小的17岁,最大的27岁,年龄大的,许多是调干生,那班会前叫我名字的,解放前打过游击,入学前是一个副区长,现在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从文艺才能看,在入学前、入学不久便频频发表作品的大有其人,有的诗歌上了“诗刊”,有的散文上了“人民日报”,全班年纪最大的一位,还写哲学论文在报刊上与哲学系一位老师争鸣,真是了得,比较起来,我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大学四年,我确实相当用功。那时上课,有不少课程没有教材,如中国文学史用的是李长之的书,但买不到,只得拼命记笔记,惟恐漏掉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除正课之外,课外各种活动也甚积极,也开始学习搞创作,可惜成绩平平,如根据自己晚上与部队一起站岗的体验写了诗歌《夜哨》,根据在三明工地自己动手盖竹棚学抹灰的经历写小说《抹灰工的信》,都发在学生自己编印的刊物“鼓浪”、“波艇”上面,另一篇关于当时“向党交心”的体会文章,发在校刊上。还有一次参加大学生慰问团到前线慰问部队,根据报刊上的一首长诗动手加以改写,背熟了登台朗诵,满怀激情,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不过在班上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小儿科”。

但我的用功算有点成果,那就是学习成绩甚是了得。四年下来几十门课程,除马列主义基础课按反右斗争的表现被评为良之外,全部为优,包括平时作业、小考都从未失过手,这在110位同学中是惟一的,在成绩这一点上保持了入学时的领先地位,又使我感到自慰。而且,这一点似乎也得很得领导、老师的赏识,在毕业分配工作还未正式启动之前,便有一位兼有领导职务的老师与我谈心,问道:“启宗,对文艺理论有兴趣吗?愿意留在系里工作吗?”留在系里,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最高奖赏!哪有不愿意之理?自然连连点头唯诺。

就这样,我成为这南方之强的著名高校里的一名文艺理论教师。

二

20多年走过的路,所受过的教育,都使我思想较为正统。搞文艺理论,我认为领导对我的爱护和信任,文艺理论课,在当时中文系所有的课程中,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而且还似乎占有一个不成文的特殊地位,被称为统帅课,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学校反复强调的是,教育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中文系的师生必须首先端正文艺思想,靠什么?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武装,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武装,落实在教学上,就靠“文学概论”、“马列文论”这些课程来贯输,来完成任務了。另外,诚如毛泽东所说,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学校的问题首先是教师的问题,教师为人师表,各方面丝毫马虎不得,这些我都铭刻在心,引为已任,引以自豪,决心身体力行,当好这个文艺理论教师。

但是,我开始工作后便强烈感觉到,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从上世纪50年

代未开始的特定环境里,想要安下心来,当好一名教师,认真教学,认真思考、研究文艺理论,实在困难太多。

首先,从我走进大学校门不久,便有反右派、反坏分子、拔白旗插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个人主义、反对“白专”道路、反对“一本书主义”、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的运动和口号。我毕业后便遇上三年饿肚子的困难时期,不久又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以及“四清”、五反“运动,反对修正主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大批判,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下乡下厂、参加运动的时间越来越多。“四清”下去近一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浪费的时间更多。正常的教学、科研、写作便被挤到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而且处于跋前踖后、动辄得咎的尴尬境地。

其次,关于文艺,当时的总口号之一是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思想跟着政治路线跑也越来越左,文艺理论教学提出要破原来“文学概论”的旧体系。当时时髦的口号是“不破不立”,破了旧的,立什么?于是毛泽东1963年、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1966年的《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及由此引出的对所谓“文艺黑线”、文艺“黑八论”等等的批判以及所谓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她“创造”的样板戏的经验都被提到凌驾一切的地位,都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努力贯彻,并以此为指导来编写文艺理论新教材,来进行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文艺理论课就批“文艺黑线”,批“黑八论”,就讲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讲“三突出”原则。前不久,见到一位当年的学生,谈起这些往事,他笑着问:“老师,‘三突出’不管用了,你不讲了吧!”我知道他明知故问,意在调侃,也只能报之以摇头苦笑了。

稍后一段时间,文艺理论界也似乎觉得这些东西太零碎了,应该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于是大力倡导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来编写新教材。从1972年到1975年,4年间我连续三次与教研室同志一起编写文艺理论教材,名称就叫“毛泽东文艺思想”。当时全国上下大体如此,不过写来写去,也就是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批评要坚持两个标准和文艺的方针政策——“双百”方针、“古为中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些内容了。

因此,尽管我毕业后便立即在中文系、在外文系上课,并竭尽努力,效果也尚

好,但是上课的内容,思考的问题绕来绕去就是那一些,还要跟着这一阵风那一阵风转来转去,变来变去,实在苦也——这时,我真有些后悔搞什么文艺理论了,如果搞语言、搞古典文学,与政治、与阶级斗争关系没那么紧密,也没有这么多烦恼了。什么基础课、统帅课,此时此刻自豪之情逐渐消磨,信心和决心也几近于崩溃。

不过,客观形势总会有些起伏变化,主观努力也不会完全停止,除教书外,适当的机会也努力参加一些文艺界活动,写一点东西。1961年,阶级斗争的弦似乎松了一点,文艺界也有点贯彻“双百”方针的样子,厦门高甲剧团继演出《陈三五娘》之后,又挖掘传统,演出了《审陈三》,文化局组织文艺界人士观看并进行讨论,我当时初出茅庐,在会上发了一通议论,引起一些注意,事后写成《评〈审陈三〉》一文,发表在“厦门日报”上,这算是我生平在正式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了。直到12年后的1973年,对一段时间内发表在厦门市刊物上的一些诗歌作品作一个综合分析评论,写成《塑工农兵形象 抒工农兵豪情》一文,发在“厦门文艺”上。说来可怜,从1960年到粉碎“四人帮”的16年间,我正式发表的文章仅此两篇!此外虽还有些变成铅字的东西,但都未正式出版,包括1963年参加省委写作组写的一组好人好事和前面提到的三本“毛泽东文艺思想”教材。还值得一提的,便是在厦大函授部工作时所写的一些东西了。

1963年,现在厦大海外教育学院的前身厦大华侨函授部,旗下的教师属双重领导,行政上属函授部,业务上属原来所在的各系,这一年,中文系人员经过调整,我被编入函授组,按双重领导的体制,也算是函授部的教师。当时函授部的教学对象主要是东南亚各国——印尼、柬埔寨、菲律宾、泰国、新加坡、越南等地的华侨、华人,自然不能象对国内学生那样大谈政治、大谈阶级斗争,当时的顶头上司中侨委领导给函授部的基本指导方针是以传授知识为主,“不谈政治,就是政治”,所以很自然地可以讲一些“纯知识性”的东西。在我与另一老师为函授部编写的“文学概论”中,便写了诸如文学作品的分类、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中国的优秀文学传统和中外文学的交流等等面对校内学生不能多讲,而在这里可以大讲特讲的内容,因而有一种可以自由地舒一口气的快感。和“文学概论”相配套,还分别编了两本学习参考资料。此外,为理论联系实际,在函授部定期内部出版的“教学参考资料”上发了一些指导学生理解教材做好作业的辅导性文章。“四人帮”被粉碎后,函授部恢复、扩大,改名为厦大海外教育学院后的

1982年,我还参与重编“文学基本知识”和“中国语文”的部分教材、教参。前后几年的工作,算是为维系华侨、华人和祖国的联系,让他们了解祖国文化,唤起他们对祖国的爱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贡献了一点微薄的力量,对个人来说,也算是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稍为拓展一下思维空间,也可以练练笔写文章的园地吧。

三

如果说我还算可以的写作能力得到还算可以的发挥的话,那确实是在1976年金秋十月粉碎“四人帮”、文艺迎来第二个春天以后。这时我虽已是40周岁的中年人了,但春天的生命力是旺盛的,春天带给人的力量是巨大的。

这一时期我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发表在“福建日报”上的《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用毛泽东的话阐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多样化,批判“四人帮”人物形象“高、大、全”的谬论,为被“四人帮”批判的“中间人物论”翻案,为中间人物争取应有的一席之地。

不久,积极地投入福建省文艺界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先后在“福建文学”上发表《抒情诗要抒人民之情》、《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两文,在争论各方的不同意见中,可以算是树一家之言,受到了一定的关注。此后约七、八年时间,一发而不可收,可以算是我个人写作的丰收期。因为数量稍多,不能一一列举,下面便不揣冒昧,把这一时期的文学成果,归类分别做简要介绍。

主编、参与编著: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拟出版长篇小说提要的系列丛书,他们考虑到长篇小说篇幅长,数量大,如能提供给读者每一部小说的情节梗概,让他们了解各时期长篇的概貌,再根据需去选择部分原著精读,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一位同事接受了这一观点,邀我合作,我欣然同意,并首先选择难度较大的现代部分动手,因为现代长篇散佚较多,一般读者乃至专家都难以找到原著,编出来意义更大。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包括奔赴各地查资料、找原著;包括邀请北京、南京、上海的部分学者合作;还包括与有关作家及其亲属建立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直到原著查寻有充分把握后,分别由多人写出梗概,再由我们统一修改、润饰、整理编辑成书,全书收入现代小说262部,60万字。作为主编,我们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后,带此书到香港参加书展,获得广泛好评。香港著名诗人诗剑著文评介,称阅读此书,犹如“走进现代

长篇小说的长廊”。

接下来一鼓作气再编《中国小说提要》(当代部分),当代长篇存世量多,省去许多寻找原著的功夫,但篇幅更长,数量更多,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的长篇便有近500部,编写成书近100万字,于1990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引起更多国内评家的注意,评论称它是“当代长篇创作的缩影”,赞扬它“为当代小说立档”,肯定它是“走进当代长篇小说之林的‘钥匙’”。

关于1979年以后长篇小说的有关资料,我们也已有了不少积累,并写成多篇梗概,可惜由于出版社负责该项工作的责任编辑不幸去世而搁置下来。

《美育基础知识》一书,是我1986年到汕头大学支援工作时,一位教授应教育科学出版社之约,为非艺术类中专学校编写的教科书,因当时我正在上“电影艺术概论”课,对戏剧也有兴趣,便承担了“戏剧、电影、舞蹈欣赏”这部分的编写工作,因为是教材,印数较多,还多次重版。

《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是我所在的文艺理论教研室与海峡文艺出版社签约的一本专著,我于小说较为熟悉,便撰写解放区小说史部分,该书1994年出版后因确有其独特的创意,内容也较扎实,曾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奖著作类二等奖。

还有一本专著,是我和一同事合作写成的,付出的劳动也较多,可惜完稿已近10年,至今仍未出版。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几位前辈革命作家策划,拟出版一批延安时期作家的评传,某出版社承诺出版。我们敬佩女作家草明毕生坚持贯彻《讲话》精神,坚持为工农兵服务方向,坚持一辈子写工人的精神,认领了《草明评传》的撰写任务,并得到草明本人及其亲属子女的支持,1994年初稿完成后经草明本人审阅过,但由于当时承诺这一工程的出版社负责人逝世而搁置下来,经多方努力未果,草明也于前年不幸辞世,着实叫人唏嘘痛惜!

理论文章:这类文字,该是我的本行,可惜由于前面谈到的时代原因和个人主观努力不够,收效甚微。

我的理论文章,有对文艺理论问题进行阐述的,如《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文艺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不要忘记文艺的典型性》、《谈文艺灵感的两个问题》、《杂谈现代化与现代派》、《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等,也有些不局限于文艺而涉及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如《什么是文艺心理学?》、《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讲话〉精神与年青一代》等,又如退休后参加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的研讨会,写了论文《〈论语〉对“三德”建设的

意义》等。《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一文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为指导,回顾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在此问题上的“左”“右”两种倾向的表现,提出二者关系应有的正确认识,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该文被收入《厦门市优秀文学作品选》(文学评论卷)和多种文选。《〈论语〉对“三德”建设的意义》被收入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的《传统文化与思想道德建设》一书,此外,还有多篇被收入各种文集。

文艺评论:以理论为指导,联系文艺作品、文艺现象的实际谈自己的看法,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应有的职责。为此,文艺评论,特别是一段时间对影视作品简短的评论,可以称得上是我这一时期写作的热点。

我的文艺评论多关注厦门本地的作家作品,如评谢春池的《评〈白鹭之旅〉》、《〈喷薄欲出〉漫评》,评张力的《寻找一片新的土地》,评舒婷和朦胧诗以及其他一些厦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也发过一些文章。

关于影视评论,则比较集中地对1995年至1997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进行评论以及对与影视有关的各种问题发表议论,,也较集中地发表在这段时间的“厦门电视报”的“一周论坛”栏目上面,计40多篇。由于时间、栏目集中,每篇1000多字,短小精悍,报纸的版面安排也较为醒目,为此造成一定的声势,给读者留下良好的印象,听说其中还有个别篇章被其他报刊转载,还有人撰文评论我的这些短论,可惜我都没有见到。不过其中的《仰视、俯视、平视》一文获得华东地区城市广播电视报优秀稿件一等奖,全国城市广播电视报优稿评选二等奖,全国城市广播电视专业委员会先后给我寄来了获奖证书,对我算是一种鼓励吧。

杂文、随笔、散文:发表议论、抒发感情几乎可以说是每个正常人的一种本能。我自以为是感情比较丰富的人,一个对人、对事常常有一些看法,而且常常需要一吐为快的人,又会耍一点笔杆,拿起笔有时便会情不自禁地将所见所闻所感流泻于笔端,形诸于文字,这些东西,信手写来,形式不拘。其中有些针砭时弊,带有批判性,本有意写成杂文,但鲁迅先生的笔法不容易学得来,比如先生善用反语,有辛辣的讽刺,先生常从一件事引伸开去谈古论今,纵横捭阖,我功力不够,又常急于把道理正面讲出来,于是我的所谓杂文,有些象,有些不象。有些文字并没有明显的批判成分,只是就事论事,引伸谈一些看法,权且称为随笔。还有一些叙事成分多些,抒情意味浓点,几乎没有批判成分,便称之为散文了。反

正以文学作品的分类而言,这三者都归于散文,界限本来难以分得太清,写起来更自由些,这样的文章,共有70多篇。其中《看〈冒险的代价〉杂感》被收入《厦门市优秀文学作品集》(散文卷),《评“堵嘴木”》获福建省杂文征文优秀奖,《搬家小记》获厦门大学改革开放20年征文一等奖,也还有一些被收入各种文集的,不赘。

其他:就写作而言,还与人合作为厦大校庆60周年写过《厦大风貌》的电视纪录片;在长期的教师生涯中写过几篇教学经验总结、教学方法体会之类的文章;在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特别是筹办系庆等活动中写过一点总结、通讯报道等宣传文字;在退休前后直至今日,担任我中学的母校——龙海一中厦门校友分会刊物“厦门校友通讯”的主编8年,自己在上面写的各种纪念、回忆文字也有十来篇,这些也算是自己为各方面奉献留下的一点痕迹。

如果不囿于文学写作,前面提到“我朗诵,我演讲,我表演”,倒也几乎贯穿着我的一生,因为还算是文艺活动的范围,不妨说几句。

我对朗诵一直有兴趣,小范围的不讲,慰问解放军朗诵诗歌就有好几次。1992年的厦门大学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50周年晚会上,我朗诵诗歌并兼当主持人,1999年厦门大学举行建国50周年万人升旗仪式,配以老中青三代人用诗歌朗诵的形式歌颂伟大祖国的历程和成就,我是代表老一代的朗诵者,引起人们包括许多老朋友的目光。

年轻时在系、校参加过《阿Q正传》、《钦差大臣》、《渔人之家》等著名话剧的演出,兴趣极浓,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表演之类活动少了,但前些年,有机会参加《血与火的洗礼》、《台湾海峡》等影视剧的部分拍摄,仍感到趣味盎然。

四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不知不觉地已近古稀之年。拉拉杂杂写了上面这些以后,还想为自己做几点归纳概括。

第一,我的文艺思想,前面已有自我评价:“较为正统”,老朋友都比较了解,不熟悉的同志从上列的叙述或仅从我例举的一些文章的标题也大致可以知道一二。正统,尽管有人要打倒它,而我仍认为是好事,仍要坚持。比如文艺为人民,比如文艺反映生活,比如艺术要给人美的享受等等,这些我将永远坚持。有的朋友善意地认为我“过于正统”,认为我如果开放一些,可能成就大些,我很感谢,

但哪些方面“过于”？怎样开放？亦常常苦苦思索，有时不得其解，便也自慰道：老了，改也难！

第二，我为人崇尚坦荡率直，为文崇尚真情实感，叙事则直面现实，抒情则直抒胸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等等前辈大师们的教导，不敢忘怀。为此，我为文只求文字流利通畅，不事雕琢，当然，也和自己功底不足有关，精细描绘、旁征博引的本事较为逊色，不知在读者方面看来，是明白晓畅？还是直白浅露？只有凭他们“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

第三，我喜爱读小文章，也喜爱写小文章，我的文章，除教材、教参之外，超过3000字的不多，2000字以下的却是多数，而且，文章发在哪里，从未考虑过。因为前面几十年，没有什么“核心刊物”、“权威刊物”之类的概念，也不带着特别的目的，只是写出来，谁要就给谁，近几年有“核心”、“权威”的概念，但已养成的习惯，同样是改也难，所以文章大抵在本省本市发。可喜的是从未遭遇退稿，也极少改稿，更没有过花钱买发表的事发生，倒是每篇必赚些许稿费，朋友们鼓励我也说小文章写得好，便也有点阿Q式地以此自慰了。

第四，我参加过许多文艺组织、学术组织，都是自愿的，如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马列文论研究会，中国高校电影学会，福建省电影家协会，福建省影评学会，福建省文学学会，福建省杂文学会，福建省作家协会，厦门市作家协会等等，在其中的一些组织中担任职务，如理事、副会长之类，也都是乐意的。我自信是个重诚信、守纪律的人，对一切参加的文艺组织，包括它们的上级组织如文联、作协、社科联、宣传文化部门，都是尊重的，对我承担的所有工作，都是尽职尽责的，虽然都说不上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有什么特别的贡献，但都积极参加有关的各种会议、各种活动，努力完成交给我的工作任务。如参加宣传部的文艺评奖多次，还有组织部的文艺界优秀人才评选，高校电影学会的论著评奖，社科联的社科奖评奖，文联、作协组织的作品讨论会等等，还有如参加“厦门文学”的编委工作前后4年，都是尽力的。

本来，我没有从事严格意义上的通俗文艺的创作和研究，但也许和上面几个方面都有些关系吧，积极介绍我参加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同志赞扬我是“真正搞通俗文艺的”，在被吸收入会后，又被选为厦门市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1998年还被评为“优秀活动家”，虽然受之有愧，但内心确很感谢研究会对我的鼓励，今后当继续为之效力。

记得1986年,我在“鹭涛·厦门特区文学报”上撰文开头写道:“尽管我有过一些幻想,但我一直是个教书匠”。时间过去了近20年,我认为,这一自我评价还是确切的。尽管我的幻想——想当作家的幻想在有了作家的头衔以后似乎是已经实现了,但是,总觉得不很称职,自认为相对较为称职的,还是教书匠。

在大学的讲台上站了37年,教过“文学概论”、“电影艺术概论”、“大学语文”、“文化管理学”等课程,退休后还在与教学有关的岗位上干了5年。其间当了约20年的教学小组长、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当了4年多的系主任,在系内外、校内外教过的学生难以数计,如果包括听过我讲座、报告的更多。课外我也利用自己的一些专长去帮助学生,如接受校党委宣传部聘请担任党的报告员多年,担任学生的各种社团——文学社团、表演社团、影评社团等等的顾问、指导老师等,也不遗余力,例如曾辅导新闻系几位学生写成、拍成反映大学生生活的电视剧《请喊一声她的名字》,参加全国大学生电视剧比赛获奖等。退休后还参加多年的“关工委”工作。自己一生得到的一些小荣誉也大多和教书匠有关,如我常年主要教的“文学概论”课被厦门大学第一批被评为“优秀主干课”,我个人第一批被评为“厦门大学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称号,近期还获“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称号,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称职的教书匠的标志。

最后,还是引用“鹭涛·厦门特区文学报”那文章的末尾来作结束吧:“是的,从根本上说,我是个教书匠,一个颇感自得的文学方面的教书匠。”

目 录

郭启宗自述(代序)	(1)
-----------------	-----

第一辑：理 论

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1978.5)	(3)
坚定方向 排除干扰	
——对文艺理论教材建设的一些看法(1980.1)	(5)
“两个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確理论	
——和林彤同志商榷(1980.2)	(15)
什么是文艺心理学?(1981.4)	(23)
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82.10)	(26)
把思想教育和智能培养统一起来(1983.1)	(29)
谈文艺灵感的两个问题(1983.3)	(33)
“表现自我”的实质(1983.11.26)	(36)
在坚持中发展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1983.12.23)	(38)
“道德继承”琐谈(1984.6.16)	(40)
文化艺术领域必须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1990.2.4)	(43)
文艺的社会功用不容否定(1990.4.15)	(46)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1990.9)	(49)
弘扬民族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1991.3.24)	(55)
教育,必须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1991.6.2)	(58)
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1991.7.28)	(60)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文艺观(1992.1)	(63)

《讲话》精神与青年一代(1992.5.15)	(69)
文艺和政治关系的再认识(1992.5)	(71)
《论语》对“三德”建设的意义(2001.5)	(84)

第二辑：评 论

从加强正面人物的斗争性入手

——评《审陈三》(旧本)(1961.7.20)	(99)
塑造工农兵形象 抒发工农兵豪情(1973.8)	(102)
抒情诗要抒人民之情(1980.6)	(107)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1981.4.17)	(116)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1981.6)	(118)
不要忘记文艺的典型性(1982.10)	(129)
岂不令人深思	

——从《命运》和《第一滴血》想到的(1985.12.20)	(133)
-------------------------------------	-------

寻找一片新的土地

——评张力的中篇小说《鹰蛋》(1986.1)	(135)
------------------------------	-------

如此追求

——评中篇小说《黑氏》及其他(1986.1)	(140)
《中国小说提要》编后絮谈(1986.2)	(142)
向昨天的愚昧告别(1986.6.20)	(145)
也为《曲苑杂坛》叫好(1994.9.7)	(147)
《孟丽君》的启示(1995.6.21)	(149)
评说《武则天》(1995.8.16)	(151)
公安题材的新收获(1995.10.11)	(153)
贴近社会 走近人生	

——从孙玉胜跻身“十佳”想到的(1995.11.29)	(155)
-----------------------------------	-------

“丙洲人自己就是宝器!”

——《慄悍家族》的主题及其他(1995.12.27)	(157)
----------------------------------	-------

黄江北赞(1996.2.7)	(159)
龙的精神在延伸(1996.4.24)	(161)
传说、童话、寓言	
——看《宰相刘罗锅》印象点滴(1996.5.8)	(163)
真情的魅力(1996.5.29)	(165)
“最后笑的人……”	
——《宰相刘罗锅》剧终杂感(1996.6.12)	(167)
回归意识的觉醒	
——评电视连续剧《花帜》(1996.6.26)	(169)
在“无悔”与“悔”之间(1996.7.24)	(171)
难忘《艺海拾贝》(1996.8.24)	(173)
《明月出天山》得失略谈(1996.8.28)	(174)
不能忘记这一历史悲剧	
——看电视连续剧《远东阴谋》(1996.9.18)	(176)
《遵义会议》的有益经验(1996.10.16)	(178)
严肃对待革命历史题材(1996.11.6)	(180)
农村题材佳作多(1996.12.4)	(182)
短篇电视剧杂谈(1996.12.11)	(184)
为当代英雄塑像	
——赞《大漠丰碑》(1997.2.12)	(186)
小议名著改编(1997.3.5)	(188)
《新中国的奠基石——刘惜芬》读后(1997.3)	(190)
脱离生活虚假多	
——评电视剧《阳光地带》(1998.10.7)	(191)
一部气势恢宏的长篇报告文学	
——评《白鹭之旅》(1997.3)	(193)
《喷薄欲出》漫评(2001.10)	(199)
《东村诗集》序(2002.6)	(206)